

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述论*

黄 巍

摘要: 三线建设作为新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推动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小三线建设是三线建设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面广,涉及 29 个省区市,共计建成 200 多个企业。近年来,随着小三线企业档案搜集工作的推进,小三线企业史日渐成为探讨三线建设的重要亮点,为推动三线建设研究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中,文献史料是其重要的史料支撑,口述史料是文献史料有益必要的补充,两者的有效结合共同推动了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通过对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的积极探索,尽可能呈现小三线企业与国家方针政策、小三线企业与乡村社会、小三线企业与职工多重关系的历史世界,从而深刻认识小三线企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必将推动对三线建设、军工企业史、改革开放史、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关键词: 新中国 小三线 企业史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 1964 年至 1980 年,历时三个五年计划,建起了以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近 2000 个大中型工厂等基础设施。^① 小三线建设作为三线建设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共计建成 200 多个企业。^② 相较于大三线建设企业军工级别较高,且目前大部分企业还在运营生产,企业档案难以查阅的现状,小三线企业因其军工级别低,且大部分企业已倒闭或者破产,很多企业档案被当地档案馆保存,所以相对容易查阅,特别是小三线企业覆盖面广,涉及 29 个省区市,为全国各地小三线

企业史研究提供了机遇和可能。

学界较早对小三线建设研究的关注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如丁之铮对浙江省的小三线军工企业的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探讨;^③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张永斌、钟健英对上海、福建小三线问题进行了探讨;^④ 21 世纪前十年,有学者对河北、广西的小三线建设问题进行了研究。^⑤ 总体上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前十年,学界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零星且分散,没有形成学术影响力。近十年来,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带领的团队出版的小三线建设系列学术成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东北地区工业布局的规划与调整研究(1949—2019)”(项目号:23BZS160)的阶段性成果。

- ① 陈东林:《三线建设的决策与价值:50 年后的回眸》,《发展》2015 年第 2 期。
- ② 初期建设 268 个,另一统计数据共建设 277 个,因建设过程中,有的企业被注销,到 1985 年末调整为 229 个。笔者认为尽管统计数据不一致,但不影响本文的研究。参见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 1992 年版,第 27、148—158 页。
- ③ 丁之铮:《我省小三线军工企业的现状和今后发展的建议》,《浙江经济》1985 年第 11 期。
- ④ 张永斌:《上海的小三线建设》,《上海党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钟健英:《六十年代福建的“小三线”建设》,《福建党史月刊》1998 年第 5 期。
- ⑤ 参见刘建民:《论河北“小三线”建设》,河北师范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蒙爱群、覃坚谨:《广西三线建设的概况》,《传承》2008 年第 2 期。

果为全国小三线建设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上海、安徽,并拓展至江西、辽宁、吉林、福建、山西、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区市。回顾新中国小三线建设研究,不难发现,以小三线企业史为研究主题的成果可以说是一个重要亮点,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探讨了小三线企业建设的缘起、企业布局、调整改造、企业与当地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环境保护等相关问题。^① 这些企业史研究成果普遍使用了档案史料,发挥了相较于大三线建设企业档案难以查阅的独特优势,为推动三线建设研究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存在着企业个案、同质化研究较多的问题,这就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进行宏观、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基于此,本文拟在前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入手展开探讨,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建设概括

(一) 新中国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严峻,中国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程上来。为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作出了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②以调整工业布局。作为三线建设战略部署重要组成部分

的小三线建设,是指以地方军工为主体的29个省区市(不含台湾省,天津市属河北省辖),除上海市外的后方建设,^③主要目标是生产团以下的轻型武器,如步枪、子弹、手榴弹等,供应地方部队和民兵。

实际上,早在三线建设之前,高度关注国家安全的毛泽东就提出了“各省都要自己搞兵工厂”。1960年3月20日,他在同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人谈话时指出,“武器呢?你们有什么计划没有?自己搞兵工厂,造什么枪?自动的?工厂多大规模?”^④毛泽东对小三线建设的明确指示主要集中在1964年。如1964年6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沿海各省要搞些手榴弹、炸药厂,军工厂,讲了几年了,都没有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运去。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嘛!”^⑤同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等人汇报时进一步指出:“要搞地方武装。有些省要搞一个兵工厂。先搞修理,后搞制造,要能造轻武器和炸药。现在要从中央兵工厂的几十万工人中分出十万人给各省,组建省的兵工厂。”^⑥毛泽东要求从中央兵工厂抽出大量人力支援各省,可见他对小三线建设的重视程度。

1964年8月,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召开国防工业会议,讨论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

① 参见徐锋华:《东至化工区建设述论——上海皖南“小三线”的个案研究》,《安徽史学》2016年第2期;温权、牛一凡:《山西小三线建设始末——以山西前进机械厂为中心(1965—1992)》,《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叶青、黄腾飞:《福建小三线建设企业布局及其特点刍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徐有威、李云:《困境与回归:调整时期的上海小三线——以新光金属厂为中心》,《开发研究》2014年第6期;段伟:《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黄巍:《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三线调整——以辽宁新风机械厂(1965—1999)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张胜、徐有威:《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安徽企业发展研究》,《江淮论坛》2022年第1期;李云、徐有威:《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企业与地方经济——以安徽池州为例》,《学术界》2022年第1期;张胜:《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小三线企业与原建设地区关系演变——以安徽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2期;张胜:《安徽小三线企业调迁刍议——以企业与城市互动为中心》,《安徽史学》2023年第2期;刘博、李梦莹:《“闭锁”的现代性:“三线社会”的结构样态及其悖论——以吉林省某小三线企业社会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徐有威、杨帅:《为了祖国的青山绿水:小三线企业的环境危机与应对》,《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等。

② 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省市;三线指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11个省区,其中西南(云、贵、川)和西北(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二线是指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区;一、二线地区各自的腹地又俗称小三线。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533页。

③ 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第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59年1月—1976年2月)》(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359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59年1月—1976年2月)》(下卷),第251页。

工作,时任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罗瑞卿提出:“地方军工的建设,要立即规划,付诸实施,越快越好。”^①在小三线建设过程中,广东省委的请示报告加快了小三线建设的步伐。1964年10月18日,广东省委呈送了《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认为加强一、二线各省的后方建设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同年10月22日,毛泽东对此报告作出批示,指出:“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彭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②(邓,指邓小平。彭,指彭真。瑞卿,即罗瑞卿)同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对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指示:“中央现将广东省委10月18日报告和主席10月22日批语转给你们。中央同意并转发周恩来、罗瑞卿两同志10月29日关于一、二线各省、市、区建设自己后方和备战工作的报告,望即抓紧进行。”^③此后,小三线建设在全国各省区市逐步展开。

(二)新中国小三线建设企业布局情况

小三线企业布局具有备战的重要战略意义。1964年9月21日,罗瑞卿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建设地方军工厂的报告》,同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建设地方军工厂是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重大战略部署,不仅是为了供应地方武装,而且也解决轻武器、弹药地区配套和合理布局问题。”^④而在1964年10月29日周恩来和罗瑞卿联合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详细规划了小三线建设的整体战略部署:为了配合地方军工厂的建设和保证战时的供应,要从大城市搬迁一些必要的配套工厂到省区自己后方,并且在后方相应地建设一些小煤矿、小电站和必要的修配工厂;搞好现

有的公路、桥梁、渡口和通信线路,新建或者改建一些运输、通信设施和边境上的江河护岸工程;修建一批储备粮食、原盐、汽油等战略物资的仓库;加强一、二线后方地区的农业建设,特别是山区建设;迁建或者新建一些必需的医院和学校。^⑤

小三线企业整体布局的目的是使这些后方建设基地成为应对潜在战争威胁的“小三线”“小边区”。小三线建设企业布局、规划设计、厂址选择遵循了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要求,根据全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小三线企业布局情况,笔者整理统计出如下表格。

表1 全国六大区小三线企业布局统计表

单位:家

各大区	省区市	企业数目	总数	占比(%)
东北区	辽宁	7	28	10.11%
	吉林	13		
	黑龙江	8		
华北区	北京	3	41	14.80%
	河北	19		
	天津	3		
	山西	7		
华东区	内蒙古	9	106	38.27%
	上海(安徽)	14		
	江苏	7		
	浙江	11		
	安徽	23		
	江西	29		
中南区	福建	11	57	20.58%
	山东	11		
	广东	11		
	广西	8		
	湖南	15		
西南区	湖北	10	20	7.2%
	河南	13		
	四川	2		
	云南	13		
西北区	贵州	5	25	9.03%
	陕西	8		
	甘肃	5		
	青海	2		
	新疆	8		
	宁夏	2		

根据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1992年版,第148—158页统计计算得出。

① 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第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59年1月—1976年2月)》(下卷),第273页。

③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编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④ 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第13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0—491页。

根据表1所示,从小三线企业工业布局^①情况看,华东区最多,为106家,其中最多的省份为江西省,达到29家,上海市在安徽省建立了14家;其次为中南区,为57家;东北区主要承担着支援大三线建设的任务,在自身腹地建设的小三线企业相对较少,为28家;西南区、西北区作为大三线建设的主要地区,自身腹地的小三线企业最少,分别为20家和25家。

(三)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建设阶段和主要贡献

整体上看,小三线企业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小三线企业的建设阶段,第二时期为小三线企业的调整阶段。第一段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5年至1969年,这一时期第一批规划项目基本建成;第二阶段是1970年至1975年,属于补充项目阶段。在第一时期,1965年至1969年是小三线企业建设的主要阶段。196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罗瑞卿《关于建设地方军工三年规划的报告》,三年规划按全国六大行政区进行建设,“先建设154个工厂,生产五大类、14个品种,职工总数12.5—15.4万人,设备3.2—3.9万台,建筑面积72—203万平方米(不包括生活福利面积),其布局是以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共中央局和长江南北为战略区。”^②但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小三线建设三年规划进程受到影响,“从全国看,到1967年底应完成的小三线前三年规划的700多个项目,只有70%基本建成,中央投资21亿元,到1967年底国家拨款19亿,预计只能完成14亿元”^③有些原定第一阶段1967年完成的三年建设规划项目,直到1969年才基本建成。

小三线企业发展历程的第二个时期为调整阶段。全国小三线建设从1981年开始初步调整,到1985年基本结束,这一阶段是小三线企业由军品向民品转型的重要阶段,处于军品、民品的共存时

期。小三线企业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以及发展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整体上看,从1964年至1985年,国家累计总投资为29亿元,地方军工企业事业单位累计实现利润15.9亿元,占国家总投资的54%。有11个省区市全部或基本上收回了国家用于地方军工企业事业的总投资。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军工厂生产的外贸产品达34种,累计创汇10亿多美元。^④到1985年末,地方军工企业事业单位为229个,职工总数为25.65万人。1985年,工业总产值为17.2亿元,其中民品产值为11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4%。生产的主要军品104种,其中荣获国家金质奖的1种,国家银质奖的1种,部优质产品奖的14种。累计生产各种火炮10.2万门,各种枪械843.9万支(挺)。^⑤生产的主要民品共14大类,156种,其中荣获国家银质奖的2种,部优质产品奖的14种。^⑥

1985年后,后小三线建设时代逐步开始。此后,大部分小三线企业基本完全转产民品。在小三线企业发展历程中,历经关、停、并、转、迁等大幅度的变动,倒闭企业占据较大比重,截至2021年底,根据采集到的13个省区市173家小三线企业信息。其现状为:尚存48家,存活率为28%;倒闭93家,占总数的54%;被兼并3家,占总数的2%;情况不详30家,占总数的17%。^⑦由此可知,小三线倒闭企业达到93家,占采集到173家企业的54%,企业倒闭破产后,其档案一般保存在当地档案馆,部分内容可供查阅,这为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理论研究的史料支撑

小三线建设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其理论与研究方法、史料整理与运用等方面都缺乏比较规范的体系,特别是搜集史料难度大,学者甄别史料的能力参差不齐,因此需要对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

① 此处为277个,另一提法为268个,参见本文第1页。

② 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第132页。

③ 陈东林编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④ 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第7页。

⑤ 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第6页。

⑥ 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第7页。

⑦ 参见徐有威:《开拓后小三线建设的国史研究新领域》,《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

史料的选取、研究与利用方面进行积极探讨。

(一) 文献史料

一是经典著作、资料选集。经典著作、资料选集是研究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的重要史料支撑,如《毛泽东年谱(1949—197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1959—1976)》(下卷)、《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1949—1999)》《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等相关文献都有对小三线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历史背景支撑。

二是档案史料。档案史料在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在全国各省区市的档案馆馆藏中,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小三线企业档案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主要包括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上海市小三线协调办公室、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上海市后方机电工业公司等卷宗,共计22247卷,^①收藏了如上海金星化工厂、上海光明机械厂、上海协作机械厂、上海协同机械厂、上海八五钢厂等几十个上海小三线企业的档案卷宗;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有1964年至1973年北京市小三线企业档案100多卷,^②收藏有如第一农具厂、第二农具厂、东方机械厂、曙光机械厂等小三线企业的档案;江苏省淮安市档案馆馆藏有原淮阴地区的小三线企业档案资料7975卷,^③主要包括淮阴市国防工业办下属5家小三线企业档案,包括淮河化工厂、滨淮机械厂、天明化工厂、永丰机械厂和红光化工厂;辽宁省辽阳市档案馆馆藏小三线企业档案共计2295卷,^④收藏有如辽宁小三线企业新风机械厂、新华机械厂、新兴机械厂的档案卷宗,其中新风机械厂1342卷、新兴机械厂522卷、新华机械厂431卷;江西省宜春市档案馆馆藏小三线企业档案共计100卷,^⑤收藏有如工卡模具厂、江西锻压厂、江西

专用设备厂等企业的档案,等等。

三是地方志、行业志、企业史志。地方志如《上海首轮新编地方志中的上海小三线建设》《辽宁省志·大事记》等都有对小三线建设的相关论述,还可以通过一些行业志如《地方军事工业》《上海电力工业志》《上海机电工业志》《上海钢铁工业志》《沈阳市志·工业综述·机械工业》等了解小三线企业的相关情况。全国大部分小三线企业基本都撰写了企业史志、厂史,如辽宁的《新风机械厂厂志(1965—1999)》、江西的《江钢志》、浙江的《浙江解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志》、青海的《青海化工厂厂志》等,这些企业史志、厂史是研究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珍贵的文献史料。

四是日记、工作笔记。日记如笔者搜集到的辽宁新风机械厂原纪委书记《冯贵芳日记》10本,^⑥时间从1967年1月至2000年5月,跨度长达33年,记录了新风机械厂建厂、生产、经营、发展、变迁、破产以及个人生活等相关情况;还有如上海大学历史系搜集到的甘肃省原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宫保军一年的日记(1990年11月22日—1991年11月22日)。工作笔记如上海大学历史系搜集到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组织人事处处长王德敏的《上海皖南小三线调整时期的工作笔记》(1985年7月4日—7月27日)和上海新光金属厂原厂长孟繁德的《上海小三线新光金属厂工作日记》(1982年1月—3月)。但日记、工作笔记难免带有个人的主观情绪,因此,对这些史料应当有所鉴别,科学利用。

五是影像资料、网络媒体。近些年,上海、安徽、辽宁等省份的小三线亲历者、研究者搜集整理了一些影像资料,如《那时,阿拉在小三线》《尘封记忆——安徽小三线纪实摄影展》《新风机械厂厂史影像纪实》《一个人 一代人》等,还有以小三线建设为背景的纪录片,如凤凰卫视和上海电视

① 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一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8页。

② 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2页。

③ 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二辑,第355页。

④ 徐有威、陈东林执行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五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9页。

⑤ 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三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1页。

⑥ 冯贵芳(1930—2001),1965年从辽宁抚顺调到桓仁县新风机械厂工作,历任新风机械厂党办秘书、劳资科长、党办主任、纪委书记。

台策划拍摄的五集纪录片《千山红树万山云——“小三线”青春记忆》，这些影像资料都是研究小三线企业史的宝贵资源。同时，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一些小三线建设亲历者和研究者通过微博、微信、QQ等发布大量有关小三线企业的相关信息，这些网络媒体也应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二）口述史料

在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的研究中，尽可能广泛、全面地搜集各种相关文献史料，是做好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由于大部分文献史料具有“自上而下”的精英化特点，从而难以真实呈现普通大众多元化的思想观念，这就需要具有多样性、广泛性的大众话语对文献史料进行有益的补充。近些年，口述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标志着史学研究聚焦从既往的主要依托文献史料开始注重从社会民间史料中搜集历史信息，从而和文献史料形成互补。新中国小三线企业由于距离当前时间较短，很多企业员工还都健在，使其研究方法和史料的选取与利用有其独特的优势，这种独特的优势就是其能很好实现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的互补。通过搜集口述史资料，注重当事人自身的体验和感受，从当事人的角度看待历史，力图再现真实的历史。

1. 小三线研究者采访整理的口述史资料。近年来，上海大学历史系研究团队出版了系列成果，其中《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采访整理了43位上海小三线建设亲历者的故事，如《难忘小三线——原上海小三线协同机械厂瞿惠相口述》《采访孟繁德》《铁姑娘的青葱岁月——原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张薇薇口述》等都属于口述史的代表成果，还有如笔者目前已经对辽宁小三线企业新风机械厂、新兴机械厂、新华机械厂几十名职工群体和家属进行了深度口述访谈，已形成口述访谈录近10万字（未刊稿）。在实际的研究中，将口述史料与档案史料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力争使研究结论更加立体、客观、公正。

2. 小三线亲历者的口述史、回忆录。徐有威教授、陈东林研究员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一辑至第十辑，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位小三线亲历者的口述史、回忆录，如阮仪三的《上海皖南小三线工程勘察内幕》、陈耀明的《我

所知道的上海小三线自强化工厂》、钱家铭的《总结经验 开拓进取》、王廷选的《宁夏小三线宁夏化工厂（5225厂）筹建始末》、冯伟的《辽宁小三线新风机械厂（965厂）忆旧》等。这些口述资料大都回顾了各省小三线建设的历史沿革、发展历程以及小三线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为小三线研究者提供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口述史资料，是研究小三线企业史的重要资料之一。

（三）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在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中的有效结合

新中国小三线企业由于许多职工还都健在，使小三线企业史研究方法和史料的选取与利用有其独特的特色。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史料运用上，诸如文件、选集、文集、年谱、档案、地方志、资料汇编、企业志、厂史等都是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关注的重要文献史料。在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甄别与利用上，需要小三线企业史研究者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加强对史料真实性、客观性的分析、解读与运用。但是，由于大部分文献史料具有“自上而下”的精英化特点，这就需要“自下而上”能呈现社会大众思想观念的口述史料的补充。通过口述史料的搜集，可以实现从普通职工的视角观察问题，其目的是透过普通职工的立场，审视政治与经济、国家与权力、重大历史事件的现象与本质，以期实现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强调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并不意味着仅仅将研究局限在普通职工的历史，更意味着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不去关注宏大叙事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精英文化，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注重社会文化与国家意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小三线企业史相关问题时，需要自觉地进行立场的调整与转换。

在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中，尽可能广泛、全面地搜集各种相关文献史料，是做好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口述史料的应用，使其能很好实现和文献史料的互补，两者的有效结合共同推动了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一方面，文献史料既有其独立的文献价值，又可以为口述史料服务，是研究者在口述采访前的必要准备；另一方面，口述史料也是文献史料有益必要的补

充。研究者在搜集口述史料时,也需要多思考并积极引导口述人,顺着口述人的思路,深入挖掘其脑海中的历史记忆,实现和既有已掌握的文献史料的有效结合,以便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分析、解读,从而尽可能得出客观、公允,经得起历史和时代推敲的研究结论。如文献史料对扎根山区建设小三线的职工表述往往是“好人好马上三线”,而通过搜集小三线企业职工的口述史料,可以获取广大职工为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大量历史记忆,既可以看到大多数小三线人为建设祖国怀有宏大政治理想“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也可以看到关注自身生存利益而要求调离三线的少数群体,成千上万名小三线企业职工的所思所想往往更真实呈现了历史世界的多维面相。

新中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的实践探索

(一)时代与变迁:小三线企业与国家方针政策

小三线企业历时三四十年,横跨新中国风云激荡的近半个世纪,期间既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担负着为国家生产军品任务的重要职责,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由军品向民品的转型探索,还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到来后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此过程中,有些企业败下阵来倒闭破产,有些企业转型成功,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小三线企业的产生、发展变迁与国家方针政策密不可分,国家方针政策的变化决定了小三线企业的命运与走向。

小三线企业在国家三线建设重大战略部署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于1965至1967年形成第一轮建设高潮。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以“战备为纲”的形势进一步推动了小三线建设,全国各地的小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轮高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小三线企业逐渐进入到调整改造时期。关于小三线企业的未来发展之路,1978年7月,邓小平在听取第五机械工业部汇报时发表了“军工企业要走军民结合的道路……小三线的生产要合理”的重要

指示。^①1980年11月,全国小三线地方军工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小三线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问题。1984年8月,国家对小三线企业进行了调整,对小三线军工企业的调整,一是不再保留小三线军工生产体系,绝大多数企业都要转产;二是由地方想办法自行转产;三是转不了、办不下去的企业要关停,关停后,好的设备和技术人员调出,余下的设备和技术人员逐步处理。^②

小三线企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此后,国营企业按照国家方针政策进行了改革。作为国营企业,小三线企业普遍实行承包制等经营管理方式,扩大企业自主权,取得一定成效。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小三线企业逐渐失去了国家优惠政策的保护,需要和其他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站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是小三线企业的产权主体,小三线企业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小三线军工厂所需的国家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由各省、市、自治区统一向国家和有关部门申请。小三线生产的军品,由省、市、自治区支配。”^③小三线企业的运行可归纳为四句话:“计划国家下,资金国家拨,材料国家供,产品国家收。”但是,市场经济到来后,这四句话哪一句话也不行不通了。小三线企业转产民品后,企业生产的民品不需要报批政府批准,而生产出的民品需要面向市场平等竞争、销售,小三线企业欲走出计划经济的窠臼却面临着诸多困境。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建立起来的大部分小三线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差,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向小三线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民企业由于包袱沉重,成本居高不下,政策限得过

① 陈夕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281页。

② 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第101页。

③ 《关于小三线军工厂归地方领导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SZ139-006-0490-0014,第2页。

死,很难与个体企业竞争”。^①而小三线企业生产的民品基本属于微利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是难以立足,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小三线企业普遍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承揽外单合同,搞横向经济联合、租赁、融资、兼并等形式改变企业困境,但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经济运行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内部管理模式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先进理念,都使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建立起来的小三线企业一时难以适应。

由于小三线企业与政府长期形成的紧密联系,两者之间在自主与放权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虽然在政策的理论层面,政府应该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但在实践的操作层面,往往与理论相悖。通过小三线企业史研究,可以长链条理解小三线企业与国家方针政策的发展变迁关系。

(二) 碰撞与融合:小三线企业与乡村社会

作为“嵌入”到乡村社会的小三线企业,有其相对独立的性质,小三线企业在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中,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小三线企业史的研究,可以多视角呈现具有工业文明特质的小三线企业与传统乡村社会“碰撞与融合”的关系。

首先,为加强工农结合、巩固工农联盟,从政府到小三线企业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援当地农业生产是小三线企业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举措。例如,为配合小三线企业的建设,政府一般都会在小三线企业周边地区建设小煤矿、水电站、修配厂,修建公路、桥梁等,着力加强周边城市、地区的农田水利等方面的生产建设,并适当疏散大城市中的一些企业到山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当地的区域工业布局,为发展当地山区工业,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农田水利建设亦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在教育、医疗方面,小三线企业也与当

地农村加强了工农结合。为使小三线企业能安心扎根山区建设三线,政府一般都为小三线企业建立学校、医院等配套生活单位。小三线企业学校在吸收小三线职工子弟入校的同时,一般也会吸收当地农民的子弟入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工农联合。同时,由于小三线企业建立的医院医疗技术普遍高于当地农村医院,接诊当地人,为当地农民服务,也是小三线企业医院的业务之一。如据上海小三线古田医院统计,在1971年底,古田医院门诊接诊19499人次,其中工人8714次,农民10785次;住院部接诊228人次,其中工人113人次,农民115人次。^②可见,农民在上海小三线古田医院的接诊人次已达到55%以上,超过接诊工人人次。

再次,在文化娱乐交流方面,作为工业文明代表的小三线企业也把城市文化特质带到了乡村社会。如为丰富小三线职工文化娱乐生活,小三线企业普遍建立了礼堂、购置电影设施,并定期放映电影,进行文艺演出等。通过这种方式,使当地农民也有机会观看到,如《白桦林中的哨所》《开枪,为他送行》《铁道游击队》《列宁在十月》《追捕》《冷酷的心》等影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娱乐相对匮乏的时期,这不仅丰富了小三线企业职工的文化娱乐生活,也使农民看到了乡村社会以外的世界,加强了工农联盟。

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由于小三线企业普遍建在山区,当地可利用耕地本来就少,小三线企业与当地乡村社会亦存在矛盾关系,焦点就是土地和环境污染问题。尽管在小三线企业初建选址时,为缓和由于建立小三线企业需占用当地土地而可能引起的工农矛盾,国家有过战略思考,如1965年,罗瑞卿在向中央报告小三线建设问题时指出:“建设地方工厂必须贯彻不占高产田,少占可耕地,不迁居民,便利居民的原则。”^③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为节省成本,占用当地可耕地资源成为全国各地很多小三线企业选址的主要

① 《国营新风机械厂1995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总结,调整厂各级劳动调解组织,包装制品厂停业的请示、通知》,辽宁省辽阳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6-0-B121,第29页。

② 崔海霞著:《飞地: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八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8页。

③ 参见庞高鹤主编:《地方军事工业》,第16页。

选择,而这日后也成为引发当地工农矛盾的突出问题。

纵观全国各地小三线企业的相关档案资料显示,土地问题是小三线企业与乡村社会产生矛盾比较集中的核心问题,如上海、安徽、辽宁的小三线都出现了因土地引发的工农矛盾问题。^① 而因小三线企业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当地农民比较不满的地方,据目前掌握的全国各地小三线企业档案来看,至少有包括上海、广东、江西、河北、山东、四川和江苏等地的小三线企业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问题,当时已受到政府、企业和职工的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治理。^② 还有如笔者在采访辽宁小三线企业所在地的农民时得知,“小三线企业新兴厂生产的子弹,有很多废弃的铁屑,厂子的工人就把子弹的废铁屑经过硫酸处理,产生很多废物,顺着地下淌,污染了当地的河流和土地,使水资源污染严重”。^③ 可以说,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由土地引发的工农矛盾,进而引起的环境污染直到现在仍不能让这些农民们释怀。

此外,小三线企业与当地农民在社会治安等方面也存在矛盾。由于小三线军工企业有保密的性质,而当地农民多年来已习惯随季节到山上砍柴、采蘑菇、采山野菜等,这导致了双方一直矛盾不断。还有如辽宁、上海、安徽都出现了三线企业财物被盗,^④ 以及意外事故发生后争抢资源的事件,都是小三线企业需要和乡村社会协调化解矛盾的重要问题。

(三) 小家与国家:小三线企业与职工

小三线建设时期,生产与生活是贯穿小三线企业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其中,小三线企业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带领职工完成国家下达的军品生产任务,企业职工是小三线企业顺利运行的重要

保障。小三线企业职工来源基本遵循了“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以辽宁小三线新凤机械厂为例,中共党员比例普遍较高,从1965年至1976年,中共党员占全体职工比例分别为22.3%、19.9%、18.9%、23%、24.9%、29.3%、30.9%、33%、31.9%、32.2%、33%。^⑤ 上海大学崔海霞副教授的《飞地: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一文,对上海小三线职工来源及其构成情况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了解到“又红又专”的骨干力量是上海小三线职工来源的主体。此后,随着上海小三线相继建成并开始投入生产,对一线职工需求量增加,“老三届”和“新三届”毕业生也逐渐成为小三线企业生产一线的主力军。

为使小三线职工扎根山区建设三线,小三线企业采取多项措施稳定职工的“小家”。由于小三线企业基本都建在偏远山区,而小三线职工基本都是从城市来,城乡物质条件、生活水平、精神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落差,使小三线企业职工一时难以适应。从全国各地搜集到的小三线企业档案来看,职工配偶工作、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日常生活等都是小三线企业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因生活条件艰苦导致的日常食品供应困难,几乎成为全国各地小三线企业普遍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小三线企业史研究可以了解,上海、安徽、江西、辽宁等地小三线企业都采取了如以物换物、到外地采购、开荒种地、养猪养鸡等多项措施改善职工生活,确保小三线生产与生活的顺利运行。

小三线建设时期,体现国家意志的标语、口号等在公共场所或私人领域随处可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着小三线职工的思想,使他们更加坚定建设小三线的决心。正如江苏淮安小三线职工所言,“当时还有四句口号:‘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① 参见李云、杨帅、徐有威:《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地方关系研究》,《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黄巍:《突破与回归:辽宁三线建设述论》,《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② 参见徐有威、杨帅:《为了祖国的青山绿水:小三线企业的环境危机与应对》,《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③ 焦先生:《新兴机械厂占了我们村的土地》,《黄巍三线建设访谈录》(未刊)2017年,第25页。

④ 参见黄巍:《东北工业布局发展变迁与实践探索(1949—1999)》,辽宁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崔海霞著:《飞地: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八辑,第186—196页。

⑤ 《国营新凤机械厂厂史概述》(内部资料),(1970年没有统计数字)1985年。

我们听到这些口号,又有毛主席的号召,就来参加小三线建设了”。^①小三线企业把体现国家意志的标语、口号写在厂房、车间、办公室、食堂、大礼堂等公共场所,例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先生产、后生活”等,时至今日,这些标语和口号在很多小三线工业遗址仍然清晰可见。

小三线企业在完成军工生产的同时,对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亦很重视,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成为鼓励职工扎根山区建设小三线的重要举措之一。小三线企业的内部机构非常健全,其中,工会、团委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会、团委通过组织各种职工活动,丰富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举行运动会、知识竞赛、乒乓球比赛、文艺汇演、游泳比赛、广播体操比赛等。小三线企业工会基本每年都会评选先进生产工作者,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同时,小三线企业也积极引导文明的生活方式,如倡导节约、婚礼从简、和谐邻里、禁止赌博等。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即便看似简单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已是难得的精神食粮,小三线企业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精加工、创优质,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确保了小三线建设军工生产任务的完成。

作为上传下达的小三线企业,需要起到好职工的“小家”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关系,为此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职工扎根三线。广大小三线职工即便身居山区,但依然保持着“城市人”的生活品质,或许在他们内心深处,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或多或少还能保留着作为“城市人”的印迹,他们在衣食住行、精神生活、娱乐文化上都尽量保持着和城市的联系,延续着城市文化的特色,但毕竟身处异地山区,其文化生活又有着相对独立性、互动有限性、供需不均衡性等特点,这也是小三线人受所处时代、地域、文化等因素制约的历史必然。通过小三线企业史研究,可以看到,虽然也存在着有的小三线职工因关注自身生存利益问题申请调离小三线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广大小三线职工为支援国

家三线建设离开家乡,扎根山区,献身国防的感人事迹,实现了“由舍小家到为国家”精神境界的提升,作为覆盖29个省区市的小三线建设,其虽已成为历史,但它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结 语

近年来,随着小三线企业档案搜集工作的推进,小三线企业史日渐成为探讨三线建设的重要亮点,为推动三线建设研究进行了积极探索。拓展小三线企业史研究,对进一步深化三线建设、军工企业史、改革开放史、新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首先,小三线企业史研究将拓宽三线建设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小三线建设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大三线建设的共性,又有小三线建设的个性。相较于大三线建设企业军工级别较高,大部分企业还在运营生产,企业档案难以查阅的现状,小三线建设虽仅有200多个企业,但由于小三线企业生产的军工级别较低,且多数企业调整改造后已转为民用,大部分企业已倒闭或者破产,企业档案相对容易查阅,特别是小三线企业覆盖面广,涉及29个省区市,这为全国各地小三线企业史研究提供了机遇与可能。因此,小三线企业史将拓宽三线建设研究的内容和视野。

其次,小三线企业史研究将对深入探讨军工企业史,军民融合提供历史借鉴。小三线企业作为军工企业,是在计划经济的摇篮里成长起来的。由于小三线企业基本属于省属国营中型军工企业,其既没有大型军工企业自身具有支柱产品的优势,又没有非军工企业自主性强的优势,其军转民调整之路的经营理念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思维模式,甚至可以说始终处于走出计划与巩固计划悖论的经营状态中。可以说,小三线企业的军转民调整之路,既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探索的积极意义,又有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因此,小三线企业史研究将对深入探讨军工企业史、军民融合提供历史借鉴。

再次,小三线企业史研究对深入探讨改革开

^① 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页。

放史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政企关系、国企改革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点、难点问题。小三线企业横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小三线企业档案普遍记载了改革开放后,国营企业管理方式变革的全过程。特别是进入到后小三线建设时代,有些省份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小三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迎难而上,成为上市企业,创造巨大经济效益;而有些省份如东北地区的小三线企业却败下阵来,到底是地域差异、还是受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经验教训和历史意蕴值得深思。小三线企业涉及改革开放后国企改革的重要一环,可以把全国各地小三线企业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研究,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最后,小三线企业史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新中国经济史的探讨。小三线建设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全国29个省区市逐步建立起来的,包括200多个企业,涉及数十万职工和家属。作为新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无论是在小三线建设时期,还是在小三线调整时期,抑或在后小三线建设时

代,小三线企业在改变贫困山区面貌、带动山区工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创造外汇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小三线企业转型得失与历史经验仍然是一种特殊的价值所在,而从企业史研究的独特视角,亦将有利于深化对新中国经济史的探讨。

虽然近年来,小三线企业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着研究成果分布不均衡的特点。上海、安徽小三线企业史研究发展较快,江西、辽宁、吉林、福建、山西等地的小三线企业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有很多地区的小三线企业史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开拓,且目前的成果存在着企业个案、同质化研究较多的问题,所以未来要注意克服碎片化的研究倾向,从而进一步深化新中国三线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黄巍,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潘清〕